目　录

参加长沙市郊土地改革的回顾……黄曾甫（1）
十年战斗迎解放（下）……钟昌前（6）
我在陆军医院分娩前后……谷　芳（12）
"四平之战"亲历记……王卓超（17）
文艺区和平解放前后……李玉希（19）
张承俊枪杀逃难女的经过……杨树生（25）
湘江两岸擒敌寇……刘樟树　李子文（29）
望城坡杀敌记……李子文（38）
回忆日寇对我家的残害……彭玉林（41）

长沙早期玻璃制造业史料一页……肖树农　肖彦农（44）
我所知道的生生农场……肖彦农（50）
开拓园林　美化城郊
——记陈熹生前部分事迹……陈自光　陈自如（53）
长沙利民锑矿的纠葛……陈昆煌（57）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我成长的摇篮——“一中”……梁宜苏（59）
修业农校与彭国钧……彭先河（66）
私立咸嘉小学早期办学情况……吴肖宗（76）

长沙市火葬场兴建经过……钱中一（80）
长沙佛教化身窑——太乙寺……易福申（86）
长沙宁波会馆概况……刘晓华（91）

朱云谷堂……朱学方（93）
一代经师皮锡瑞……皮崇伟（100）
简述父亲吴建三的一生……吴　斡（105）
回忆伯父吴建三……吴肖宗（109）
史镛生平事迹……史以凡（112）
罗五太太轶事……彭守拙（115）
谷山寺产权僧俗之争……吴肖宗（118）

编后……编　者

参加长沙市郊土地改革的回顾

黄曾甫*

一九五0年春，我在长沙市工商业联合会筹委会任秘书长，由中共长沙市委和长沙市人民政府选聘为长沙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工商界代表兼协商委员会常委，旋又由市委、市人民政府指派为工商界代表，同市劳动局张平局长、市总工会林楠秘书长一道去北京，出席中央政务院劳动部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劳动局长会议。在会议期间，于三月十四日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有幸聆听了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所作的形势报告。总理在报告中最后谈到土地改革问题，勉励大家要过好"土改关"。从而使我深刻地认识到土地改革的重大深远意义。劳动局长会议之后，我率领长沙市工商联北上参观团一行十余人，到东北沈阳、哈尔滨等地参观学习，看到哈尔滨市郊老解放区经过土改以后，不仅消灭了封建剥削，而且大大地解放了生产力，活跃了城乡经济，工商业出现普遍繁荣昌盛的景象。是年四月，我回到长沙以后，曾应广播电台之邀，发表过参观后的感想，又在《民主报》发表过《土地改革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的专文。积极宣传土地改革的重要，为迎接土改作好思想准备。

未久，中央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随即在

---

* 黄曾甫系省政协委员，省、市民建工商联顾问兼两会文史会主任。

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是年七月，由市委、市人民政府与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成立长沙市郊土地改革委员会，报经省人民政府转报中南军政委员会批准，由许敬贤（市委组织部长）任主任委员，陆锦（市民政局长）、张以藩（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秘书长）为副主任委员，易锴、王化中、康德、黄曾甫、蓝肇祺、朱宜风、曹国智、马子谷、李凤荪、丑梅村、罗秋月、丁继克、谷曼、肖规、胡鹏、郑昌明、赵国忠、陈玉田、郑顺、张肃斋、丑俊云、王凯延、黄海林、邹吉祥等二十四人为委员。在南门外席草田郊区工作委员会开始办公，并由胡鹏兼任秘书，负责处理日常工作。土改委员会之下，又设有三个专门委员会：一、调查研究委员会，由黄曾甫任主任委员，李凤荪、丑梅村任副主任委员；二、巡视检查委员会，由马子谷任主任委员，朱宜风、郑昌明任副主任委员；三、宣传教育委员会，由康德任主任委员，曹国智、谷曼任副主任委员。还在四个郊区分设各区土改委员会，由赵国忠任文艺区土改会主任；张肃斋、郑顺任岳麓区土改会正、副主任；陈风、朱中立任金盆区土改会正、副主任；陈玉田、苏明任会春区土改会正、副主任。各区土改会之下，又设若干土改工作队，访贫问苦，深入基层，从市级各机关团体抽调干部共二百三十五人，其中有湖南大学师生的土改工作队三十五人。阵容整齐，开展工作，十分顺利。

湖南省土改委员会颁布了《湖南省土改实施细则》，长沙市在此基础上，根据市郊具体情况，又制订了《长沙市郊土改实施办法》，以及《市郊土改中几个补充办法》。当时长沙市郊有三万五千二百六十三户，十七万五千二百四十二

人，土地面积共有十六万余亩。四个郊区辖有三十七保(村)，其中有农业保、半农业保、街道市镇保三种类型，兼农、小手工业者以及地主兼工商业，杂处其间，情况复杂，工作相当繁重。有的地区，土地比较集中，封建剥削奇重，大地主有多至良田千亩者。双减时，据岳麓区一个保的统计，出租田地共二百二十八亩，押金计有制钱五十串文，银子二百四十两，光洋二千四百零七元，法币一百元，稻谷六百一十二石，可以概见一般农民生活贫困，生产落后。要开展郊区土改工作，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还必须通过土改之后，紧抓郊区建政工作，方能彻底摧毁代表地主政权的反动保甲及其爪牙和一切封建残余势力，农民才能够彻底翻身。因此，市郊土改会在土改进行一段时期后，根据郊区的基本情况和特点，又着手草拟了《郊区建政方案》。

在市郊土改实施办法中，根据政策规定，照顾工商业的利益。因此在实施办法第十一条中明确规定：保护工商业地主兼营的工商业及其直接用于经营工商业的堆栈、晒场、厂址、铺面、房基、器具、交通工具等土地财产，均不得没收或征收。依靠工商业足以维持生活之工商业的土地、山林、水利、塘坝及工商业以外的房屋，应予征收。其非直接用于经营工商业之出产原料的土地，亦予征收。

我当时是以工商界的代表，参与市郊土改工作，因此凡涉及工商业兼地主的问题，均被邀参与协商处理。其中特别是河东文艺、金盆两区的砖窑厂及河西岳麓区的湘粉厂的问题，夹杂着土地所有权、租赁权、使用权等等问题，市郊土改委员会均经过反复调查，充分讨论，作出实事求是的若干规定。如关于砖窑问题，即有专门条文："保护工商业与工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业有关土地之处理，土改法已有规定，市郊所特殊者为砖窑问题。砖窑多而且问题复杂，地主多以其为工商业之一部分，想尽办法对抗土改，故作如下之规定：砖窑不没收。但：①除足供砖窑用地之外的多余部分，按农田论；②砖窑久已废置者，按农田论；③地主出租土地中，窑为工商业者所建并经营，土地没收，工商业者另立租约继续使用；④地主将窑与土地一并出租，土地没收另租，地上砖窑仍属原主。”河西岳麓区的湘粉厂有些厂房、晒场，以及桔饼行的堆栈，染布厂的作坊等，涉及有关地主土地的问题，亦参照砖窑问题的规定处理。

同时市郊毗近市区，过去有些官宦巨室及工商业资本家，建有别业园林，问题亦颇复杂，如副省长唐生智在文艺区蓉园乡，即有农民师兰桂退押问题；省长程潜的副官程德梅有与新合乡农民卢德胜、李泉生的纠葛；民主人士唐伯球在林子冲有房屋转让问题；辛亥首义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代表人的龙璋家，散处在郊区各处的退押问题，都由市郊土改会另立专案，详细调查，妥善处理，该没收者没收，该退押者退押，该低头认罪者责成当事人或代表到乡认罪。特别涉及一些同乡会馆公产的土地问题，如金庭会馆在莲湖、雨花、新合、桂花四乡，均有退押问题，当即会同长沙市地方财政整理委员会共同协商处理。我当时亦被聘为市地整会常委兼祠庙会产清理委员会主任，乃会同市地整会干部吴松辉、单传钦，召集金庭会馆代表吴省吾、沈商农、劳端生，叶泳阁等人（皆工商业人士）到场，负责清算，依法解决。还有绸布业的新绸庄经理王严森之父，因曾在桂花乡当过团总，也通过市工商联出面，将其保释，责成退押认罪解决。一切都做到

合情合理，秉公办理，既要保证市郊土改的顺利进行，又要按照政策，不损伤民族工商业的合法利益。当时市工商联在城乡联络处的领导之下，还在北门局关祠成立了支援土改工作组，由常委陈芸田任主任，黄曾甫兼秘书长，李寿增、舒瑞昌、王世传，邓济美、易炳章、沈商农、王照生等十人为调解评议员，配合长沙县土改委员会，市郊土改委员会，受理办理本市工商业兼地主的问题，做了不少的工作。

往事如烟，转眼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回忆在党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特别是经常得到陆德、胡鹏同志的亲切关怀和具体帮助，使我在市郊土改运动这一伟大的斗争中，站稳革命立场，接受了深刻的阶级教育，完成了党和政府交给我的神圣任务，没有在工作中发生过重大事故与差错。全市工商业兼地主的人士，也能顺利地过好了土改关。至今思之，犹感振奋。兹应郊区政协文史会之约，就回忆所及，走笔记此，以供修志的参考。但时过境迁，年老记忆衰退，可能还有不少遗漏和错误之处，尚望熟悉当时情况者补充订正之。

十年战斗迎解放（下）

钟昌前*

五、两度任教宜山

一九四三年二月，曾经在广东始兴师范任教的欧阳俊、刘彦邦、容民铎等同志（都是地下党员），通过广西省教育厅的关系，到宜山柳庆师范工作。我和曾梓材（家乡热水读书会最积极的会员、勤奋的读者）在这时候也由衡阳经桂林到了广西宜山。我们经柳庆师范辅导员周乐和（现在湖南省文联工作）同志的介绍，到了县城表证第三校担任教员。

这个学校的教导主任刘彦才，为人正直。几位青年教师的思想很进步。我们相互接触后都有好感，很快成了知心朋友。为了办好学校，我们提出加强民主管理、改进教学方法、开展社会活动、废除体罚……等建议，他们都积极支持，并在教师中展开一场大辩论。可正在这时一位姓周的老师，酒醉后毒打学生，激起了师生们的愤怒。我们抓住这一事件，发动学生和家长到县政府教育科去告状。结果，周老师受到了撤职的处分。但是，姓甘的校长有偏心，更仇恨进步教师。开始，他怂恿少数学生写恐吓信，造谣攻击教导主任。接着，他又拉拢地方恶势力，对抗进步的教师。最后，

---

* 钟昌前系长沙郊区离休干部，现为省政协委员、市政协常委；民进省委常委和市委副主委。

他公开地向教导主任说：要以武力来对付。在这种情势下，我及时向党支书欧阳俊同志汇报请示。他认为，国难当头，不宜扩大事态，挑起地方派系纠纷，劝我们离开学校为好。于是，我和曾梓材离校去桂林。

到达桂林后，成达师范的教务主任陆静山（地下党员，当时是生活教育社桂林分社负责人，现在北京人民出版社工作），介绍我到教育书店担任助理编辑，曾梓材到上海木器社担任会计。在短短的两个多月里，我结识了许多同志。如新安旅行团的童××，农村经济学家王易今，生活书店负责人赵予范，诗人施琴川，教师雷天羽、何岳飞等，他们中间多是地下党员，有的至今还与我保持了联系。

同年九月，刘彦才当选为县立表证一校校长，他电请我去担任教务主任。我在到职的同时，请来了朱袭卿（地下党员）担任辅导主任，陈宪中担任童子军主任。还聘请了朱袭夫，莫刚、韦述丰、朱玄等青年进步教师来校共同办学。大家通力合作，这期教学成绩博得了县府教育科与当地群众的好评。同年下期，校长刘彦才调龙胜干训班，学校行政工作、人事任免全由我掌握。这时，正当日寇进犯西南，许多进步人士从衡阳、桂林撤退到这里，我聘请了好几个同志来校任教，其中有演剧七队陈光、桂林中山小学教导主任许璞（均是地下党员）、桂林市教育局督学郭平（生活教育社桂林分社负责人之一）等。这样，在学校三十多个教师中，进步的占了优势，民主气氛空前高涨。

不久，表证一、二两校合并（共三十四个班，一千多名学生，六十多位教师），县府派刘尧（原任国民党县党部干事）接任校长。他带来韦庄任训育主任，李某任总务主任。

接着，三青团宜山县团部派石开弦来校建立组织。这时，虽然学校换了几个负责人，三青团的组织也进来了，但是，绝大多数师生是进步的。加上新来的县长王浩明和教育科长张某都是国民党左派，思想开通，非常器重我，几次约我谈话，高度评价我的工作。他们还暗示我对校长要特别注意。因此，学校的大权仍掌握在我手里。国民党也好，三青团也罢，都对我们无可奈何。校长刘尧也知道，只有依靠我，他才能在学校站住脚，工作上不得不同意我的一些意见。一次，柳庆师范李校长企图控制表证这所规模较大的学校，要派二十多个毕业生来任课，我只同意五个，校长和县府负责的都支持我的意见。李校长的如意算盘落空了。在校内，韦庄、石开弦要成立“童子军”，我提出要成立“工学团”。经过一番

校师生中，报告国民党在昆明制造“四·一二”惨案的经过。他们情绪激烈，讲演生动，师生们听罢，无不对国民党法西斯专政表示震怒。可是事后，校长黄紫光以“人地勿宜”的理由，撤除了我的职务，我被迫离开了宜山。接着，和我要好的几位同志也先后离校。

六、辗转黔桂线上

离开宜山以后，我们一路逃难，经河池、南丹到贵州独山，找到了陆静山、郭平两同志，又经他俩介绍，认识了县府秘书肖昌璜（地下党员，现任江西赣州师院副院长）。我们原以为可通过他的关系找到工作的，但不幸得很，不久，他因叛徒出卖被捕，关进贵阳集中营去了。我们也先后到了贵阳。一九四五年下期，我在达德中学工作，其他几个同志也在贵阳中、小学任教。一天，陆愚夫（叛徒、曾认识）来校找我，要谈什么“营救”肖昌璜的事。我知道这话不是味道，有了警惕。待他走后，我便赶紧与息烽中学朱善猷（地下党员现在广州中医学院任院长）同志联系，隐蔽在他学校里担任初二班主任。为了安全起见，他改名李文华，我改名钟泽南。

在息烽中学这段时间，我们认识了息烽县邮局的张俞荪同志（张不久调龙里县）。他思想进步，经常秘密地把《新华日报》、毛主席著《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等书刊送给我们看。可是，这里环境非常复杂，附近便是国民党特务训练班“中美合作所”，我们只能在深更半夜拿出来阅读，完了付之一炬。一个学期过去，朱善猷已被学校特工人员注意，当即转移到贵阳韶华空军子弟学校任教去了。我仍留息烽中学继续工作。一天，童××匆匆赶来，把前一天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愚夫有意召集二十多个地下党员（其中有朱善猷）在旅馆开会被国民党宪警包围逮捕的事件告诉了我，之后，他在我手心上重重地写了一个“走”字又匆匆离去。我知道情况紧急，便化装出校，直奔龙里县邮局，找到张竹荪同志，请他设法掩护。他要我替一个病休的邮务员代班，我一连干了四个月，后与原宜山的同志接上了关系，便离开龙里，到广西罗城中学任教。

这里是一座山城，国民党的势力比较薄弱，我们开展工作很顺利。学校工作主要是陈光同志负责，我任教务主任。教师中参加党的地下组织和共青团组织的人数相当多。有一天，我们得知了肖昌璜、朱善猷等同志解除囚禁的真实消息，都满怀喜悦之情，召开晚会，频频举杯，欢庆战友平安，重见天日。那种热烈场面，至今难忘。

我在罗城中学工作了一年，于一九四七年下期经友人介绍到柳州湘桂黔铁路职工教育委员会，负责编写教材。这里，年青人多，湘籍同志（如杨继兴等）也多，我们志同道合，相处友好。我和刘绍祖、李瑞庆合伙订阅了长沙《实践晚报》，重庆《世界知识》、《中原》杂志阅读，不料竟惹出了麻烦。中统特务头子鹿茂堂和他安插在职工教育委员会的几个特务分子，扬言要查清我的政治身份，是否属于异党分子。他们先后叫杨继兴、刘绍祖到“调查统计室”（特务机关）去谈话，询问我的情况。杨、刘两人异口同声说，钟某只是思想激进一点，绝非异党分子，所订书刊报纸，无非是想了解一点家乡情况和国际形势而已，并无其他企图。虽经这样解释，没对我采取行动，但仍要我停止订阅这类书刊，并有人随时跟踪着我。我住的宿舍搬来一个特工人员叫谈传

奇的，他经常拆看我来往信件，查问我阅读的书籍。我早已意识到这家伙居心叵测，生活中特别警惕。每日在家潜心研究古典文学，间或写点古体诗词。过了三个月，谈传奇没有发现我有什么可疑之处，才取消了对我的严密监视。

我编写的教材都要进行审核。自从我在交通部办的学报和铁路工会办的刊物上发表了几篇文章以后，就可由自己定稿，不再送审了。我便利用这个机会，在教材里选编一些进步作家（如鲁迅、郭沫若等）的著作。有一次，我将金仲华的地理图解和翦伯赞、范文澜的现代史编进教材，被总局职校校长陈海西发现，他特地找我私谈："钟先生，你好大的胆子。在这特务众多的地方，选这种激进的教材合适吗？"我看他的态度是善意的，就把教材内容作了适当的修改和调整。

我在黔桂线上已辗转多年了，虽投身于风风火火的斗争生活，但仍有时触发思乡之情。我曾作小诗抒怀："自别家园后，他乡几度秋。湘江天际远，异地客增愁！岳麓前今健，洞庭依旧流。我为云外雁，何日得回头？"朱善猷同志知道我的心思，但他考虑当时有个新的任务——掩护部分同志和亲属（如熊子烈同志、黄道奇同志的爱人熊雪辉、刘道衡同志的女儿熊惠珊等），还要我在柳州再待一段时间。我服从工作需要，为使他们得到安全而尽力，仍留柳州。

一九四九年六月，我来到长沙，经朱善猷同志介绍，担任长沙医院职工夜校教师。我与朱善猷、宋楚湘、梁器之、易长初等同志在一个支部过组织生活，共同策划迎解工作。八月，湖南和平解放了。当时，我已在党的领导和教养下，经过整十年的战斗、锻炼，赢得了自身的解放。这是我万里长征迈开了第一步……。（续完）

我在陆军医院分娩前后

谷　芳*　　口述

一九四八年冬天，我被国民党反动派拘禁在长沙市汽车东站后面长沙警备司令部的一间监狱里。已经七个月了，无以数计的审讯、酷刑，并没有从我这个普通的中共地下党员的妻子口中，得到了一星半点的什么。当时，我身怀六甲，已临近产期，终日饮食难进，经常处于昏迷状态。同牢房的有几个武汉大学的学生，她们眼见我活活遭受折磨，义愤填膺，不时向窗外逡巡的警士责骂："人家快落月了，关着不放，还要毒打，你们有人性没有？""让孩子生在牢房里，你们绝无天良，也不得好死。"……我呢，早已横了心，要如何就如何，要想探听共产党的情况，只有三个字——"不知道"。

出乎意外，一个守传达的老头把我领出牢门，引向城外南郊……。一路上，我不敢随便与老头拉话，因见他态度和善，便问了姓氏，才知道他姓刘。

刘老头送我进了国民党的陆军医院（今省立一师附近），经医生检查胎位不正，马上给我绑了胎。医生要我就近走动走动，并摇电话告诉警备司令部，说我两三天后即将分娩。我趁这个机会央求刘老头，让我外出买些棉花草纸，他用同情的眼光打量我一下，手轻轻一扬，低声说："快去快回便

---

* 谷芳系省机械工业厅离休干部。

是。”

我约摸陆军医院离南湖港茶亭子（今南湖路）不远，七个月前，我和爱人李林（当时任中共地下党湘北工委副书记，奉调赴香港中共华南局学习）带着孩子山亮（李林前妻黄凤烈士所遗），从岳阳来长沙时到过那里，那是赵篾匠（赵连生同志，地下党太乙寺支部书记）的家里，我们的孩子山亮就寄居赵家，不知情况怎样。我急忙赶到那里，知道附近特务甚多，就装着问路，站在篾货铺门口和赵嫂子悄悄说了几句话。我这才知道，唐先生（中共地下党湖南省工委书记周里同志的化名）听到我被捕后，已托人将山亮转移到东山那边去了。我气喘吁吁又往城内南阳街松雪纸庄熊子烈家里（地下党联络站）跑去，一个女佣人出来打招呼，说熊家已经全部迁走。我心想，两三天后就要生孩子，不能连累别人，只好买了些棉花、草纸回到了医院。刘老头早已等得不安了，他见我腹部臃肿，步履艰难，催促着而又无可奈何地对我说：“司令部要你回监狱，走吧！”

过了两天，刘老头又送我去陆军医院，一路上相互沉默不语。到了城郊，行人稀少，他突然问我：“你知道肖伯鳌吗？”我被他突如其来的问话怔住，随即马上又镇定下来，带着反问的口气答话：“不知道。他怎么啦？”当时，我内心是多么急切地想知道肖伯鳌的情况，可刘老头久久默不作声，我不由得陷入了沉思……

肖伯鳌和李林都是八路军三五九旅南征时留下的地下党员，他在一家米店里做工作为掩护。七个月前李林去香港时，因任务紧急，一时不能把我送回老家耒阳，正在犯难时，肖伯鳌同志慨然同意让我暂时留居他家中（南门口吴家

坪，今五星坪五号）。李林离开长沙才两天，晚饭后，我正在门口乘凉，忽地一部吉普车冲过来在门口停下。六、七名便衣气势汹汹跳下车，说是查户口的，对我逼问："你是什么人？男人在哪里？……"肖伯鳌的姐姐肖复华连忙上前，指着我解释说："她是我表妹……"便衣们不由分说，抓住我，推上车，直开到警备司令部，把我送进监狱里。那天晚上，我上厕所，经过另一牢房，发现肖伯鳌也抓来了。他伏在窗边，象是喃喃自语，却又是给我示意，说："莫明其妙，把我抓来了，又把我一个同学的家属也抓来了。"我正想上前和他交谈，一名警士在一旁吼道："不许讲话！"过了两天，送牢饭的人递给我两个合起来的面包，中间夹了一张纸条，我躲到厕所细看，一行铅笔字写着："只说你丈夫与我同学，其他事要守口如瓶。"以后，每当我有机会走过他的窗户，他时常用寥寥数语安慰我，鼓励我，他是个多好的同志呵……想到这里，我已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向刘老头补问道："肖伯鳌，他怎么啦？"

"他，被活埋了。……只穿条短裤叉，口里……塞了一条毛巾。"我听不下去了，一行热泪夺眶而下，只差点哭出声来。刘老头看在眼里，他好心地安慰我，警惕我，继续说："听说，肖伯鳌的问题与你无关了。……你生下孩子要是逃走不了，就会把你送到法院，坐穿牢底。至于小孩，不会让你长久抱着，要送育婴堂去……"刘老头送我进了医院便转去了。

古历十二月初九早晨八点钟，与我一道经受七个月铁窗生活磨难和考验的小生命，在国民党部队医院的妇产室里呱呱坠地了。我迷迷糊糊躺在病床上，听到周围人们的议论。

有人说："肚子里有个细伢子，还要犯法，真是鬼迷心窍了。"也有人说："一个妇道人家，本本分分的样子，能犯什么王法？！"……待我神智完全清醒了，一位护士前来帮我梳头，洗面，问我识不识字，要不要看报纸。她悄声对我说："不要害怕，他们又没有抓到你男人，你怕什么罗！"说完，向我苦苦地一笑。当时，我觉得，虽然是住在国民党医院，有人误解我，屈辱我，但，也有人在同情我，抚慰我。我一定可以绝处逢生的。

我生下孩子才两天，又被警备司令部传审。那天，正值小雨加雪，寒风刺骨，浑身冻得哆嗦。路滑泥深，实在难走。两个人押着我。那个姓罗的见我走不动，对我拳打脚踢。另一个姓唐的看不过意，说："她刚生下小孩，不要再打她了。"他还自己掏钱，雇一辆人力车，让我坐车上。

在审讯室里，那审讯的官腔十足，望之俨然。他慢条斯理地一字一句对我说："肖伯螯的问题，现在与你无关了。但是，你男人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完全交代清楚。"他停了一会又继续说："你想出去，就找个熟人担保一下，你能找到吗？"

"人生地不熟，找不到。"我直截了当地回答。

"你的孩子呢？"他换了话题。

"在医院。"我答得很快，知道是问刚生的孩子。

于是，他非常果断地向在旁的命令："押回医院。"

我回到医院，时刻想着逃走。可是，手中没钱作旅费。若不离开长沙，便始终逃不了魔网。怎么办呢？我正在发愁，一位驼背的勤杂工（姓陈，不知名）一躬一躬地到我跟前，偷偷地塞给我两块光洋，他说这是一位"太太"给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